第一篇

汉字凝结的智慧

引　论

汉字，从最早的大汶口考古发现算起，已有六千年的历史。大汶口的发现时间正好同传说中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时间相当。可见，仓颉造字之说，并非子虚乌有。不过，所谓仓颉造字说，比较正确的理解应当是，汉字并非仓颉一人所创造。仓颉之所作，最多也只不过是把无数前人创造的汉字加以整理和规范化罢了。因此，如果把仓颉以前的汉字造字过程算在一起，汉字产生至今的历史，则比六千年的历史还要长的多。

当然，在人类历史上，还有一些古文字，它们也产生得很早，有的也像汉字一样古老。诸如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今伊拉克一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等。楔形文字，大约是公元前三千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年的时候，由苏美尔人创造的。后来巴比伦人、亚述人、叙利亚人、赫梯人、波斯人等，都曾采用这种文字记录过自己的语言。但是，它们的生命力却都不能与汉字相比。楔形文字到公元前 4 世纪同波斯王国一起灭亡了。埃及的象形文字到公元前 5 世纪也灭绝了，其寿命比楔形文字还短。[①] 唯有汉字，历尽沧桑，至今还保持着青春的活力。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迹。

那么，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古老汉字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呢？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误解。由于在近代历史发展中，中国逐渐从中古的先进王国沦为落后国家，所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西学者中有一些人，在把中国看成落后国家的同时，也把汉字在同印欧语系的拼音文字比较时看成“落后文字”。中国的近代发展，确实落后于西方。但是，由此就能得出曾在中国的中古时期参与和创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的汉字也已落后的结论吗？从今天对汉字的研究情况来看，这种“汉字落后”论者所表明的，并不是“汉字落后”，而是人们对于汉字的认识与研究之落后。例如，19 世纪中叶颇有名气的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就曾这样可笑地描述过汉字：“中国人为他们那个属少数几种古老象形文字之一的汉字发明了一个由八万个字符组成的庞大体系，并且由六种或六种以上的字体令世界上其他民族逊色，这是一种在大事上缺乏想象力，而却精于雕虫小技的表现。”[②] 他还可笑地认为：“汉语中的一切尽是些千篇一律的雕虫小技，说的内容很多，而用的因素很少，书写一个因素要用许多笔画，描述一件事物要用许多本书，那种

①参见孙钧锡：《汉字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年，第 12—13 页。

②《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86 页。

一笔一画地书写他们文字的做法是何等的劳而无功！’[①] 在这里，赫尔德的前一段话十足地说明，他对汉字极端无知——不仅作为传递信息的语言符号，而且是举世无双的书法艺术对象。赫尔德的后一段话则表明，他对汉字单音节及其含有丰富信息量这一特征的优越性毫不理解。

上述赫尔德的观点，乃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典型表现。这种西方中心论，以西方近代发展先进的优越感和由此而蔑视东方文化价值的眼光，歪曲甚至否定东方文化的价值。自上一世纪以来，这种观点不仅流行于西方，而且也影响了许多有志于改革的东方学者。就中国而言，不少学者在“五四”运动中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表明了他们对于西方先进事物的景仰和追求。但是，当他们转过身来，企图简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甚至“废除汉字”时，则可以看到，在这种简单否定的结论中确实表现了西方中心论思想的影响。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废除汉字”或曰汉字拼音化的主张，虽然未能实行，但是，对于汉字本身应有的科学研究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为这种主张的前提是，西方的拼音文字先进，而汉字落后。因此，对于汉字的研究，多以是否符合拼音文字的性质和法则作为衡量其优劣的标准。这就使得对于汉字的研究削弱了其作为科学研究所必须具有的客观性。即使作为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比较研究，这种单一价值取向的研究也是极为片面的。近年来，正是由于打破了上述片面性的框框，中国和世界的许多地方，其汉字的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汉字重新发现热潮。过去，从形音义各方面被看成汉字

①《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90 页。

缺点的种种特性，经过科学研究的证明，不仅不是缺点，反而是优点。诸如汉字作为方块字，其字形的二维性，其字音的单音节并具有声调的性质，其字多具词性和多义性等等，在原来以拼音文字性质为价值坐标时，差不多都被视为汉字的缺点或落后性。然而，经过重新发现，今天看来，汉字的这些性质，却是它别具洞天和独领风骚之处，是它在拼音文字之外对于人类文化独特的重大贡献。

随着对汉字优越性的重新发现，人们对汉字在人类文字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意义的认识，也在发展和深化。以往，许多学者都认为，无论东方西方，人类的文字都发端于象形，而最终发展为表音的拼音文字。就是说，把拼音文字看成文字发展的唯一最高阶段。根据这种观点，便很自然地认为，以形声字为主体和尚包含少数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的汉字，由于没有步入拼音文字的行列，所以是落后文字。但是，在所谓汉字的种种具体缺点逐一被重新发现并证明其为优点之后，特别是当汉字从不能输入到能够以多种方法输入电脑之后，人们对于把拼音文字作为人类文字唯一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观点，也不能不加以怀疑了。现在，有的学者提出，“中西文字同样从象形的起点出发，西方发展为一种纯拼音文字，汉字却没有拼音化，这并不是发展速度的差异，而是发展方向的不同，人类文化是多样性的统一”。[①] 就是说，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两者发展至今，并不是先进与落后之别，而是在同一发展水平上各领风骚。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学术观点。可以肯定地说，当我们在比较汉字与西方文字时，只要科学地论证了这个学术观点，就能够从理

①《对汉字拼音化应作文化反思》：《汉字文化》创刊号，1989 年 1、2 期合刊，第 20—21 页。

论上真正消除“汉字落后论”，并且一定能为世界语言学和文字学建构一种崭新的理论。从语言学和文字学对于其他文化部门的影响看，本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从哲学角度对于语言文字理解的突破，以至出现了所谓哲学发展的“语言转向”。这种“语言转向”，不仅表现在包含有许多分支的“语言哲学”之产生，而且一些未冠有语言哲学之名的哲学流派，也几乎无不受到“语言转向”的影响。就是说，谁都不能闭上眼睛不看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并且不能不用以深化哲学的内含和推进哲学自身的发展。同时，哲学的“语言转向”，又通过哲学对于其他文化部门的影响，把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渗透到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

上述西方自本世纪以来哲学乃至文化的“语言转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研究课题。语言，特别是文字的发明，乃是人类真正步入文明的标志。在语言文字中，确实潜藏着人类许多尚待认识的文明底蕴和尚待破译的文明密码。由此可见，西方哲学和文化的“语言转向”，确乎是对人类自身及其所创造的文明更加深入的认识，同时也就是对人类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和对以往文明创造之再创造。

从本世纪初到本世纪中叶，西方语言学无论从语言形式、结构方面，还是从语义内涵方面，都出现了创新的理论。前者以索绪尔（F·de·Soussure)为代表。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等、等等。它只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的”。[①] 索绪尔由此提出建立广义的符号学，而语言学乃是其中最重要的分支。在索绪尔的理论启示下，以及

①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7—38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其后的一些哲学家如美国的皮尔士（C·S·Peirce）、德国的卡西尔（E·Cassirer）和现代逻辑学家如弗雷格(G·Frege)、卡尔纳普（R·Carnap)所建立的种种符号理论的推动下,终于形成了渗透到广大文化领域的现代符号学理论大厦。从语义内涵方面创造新理论者，则以乔姆斯基（N·Chomsky)为代表。他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乔姆斯基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抓住了人类语言过程中的内在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使人类的语言过程区别于非人类的符号系统”。① 特别是后来，乔姆斯基更加注意语言生成中的语义作用，从而增强了语言学对于哲学的影响，使语言学与哲学进一步融合，使语言学能更深刻地揭示人本身及其创造的内涵。

事实表明，本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乃至整个文化的“语言转向”，从横向联系上看，例如，通过语言文字与其他文化部门包括哲学、艺术、逻辑、美学、心理学、电脑等高科技的相关研究，更进一步揭示了语言文字的本质。再从其纵向联系看，例如，关于语言文字本身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语言文字的起源，诸如通过研究作为史前形态的原始艺术与语言文字的关系等等，也进一步揭示了语言文字的本质。从这里不难看出，语言文字的研究，在今天已经变成由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美学家、艺术史学家和某些自然科学家以语言文字为核心研究的一项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既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于语言文字本质的认识，同时也有力地推动和深化了整个文化的研究。

如果说汉字与西方文字如上述是各领风骚，而非汉字落后，那么，在与上述西方本世纪以来语言文字学研究相比时，则我们却

① 甘柏兹（J·Gumperz）：《社会语言学与小型集团中的交流》，刊于《社会语言学》,企鹅出版公司，1972 年，第 204 页（转引自《符号：语言与艺术》，第 6 页）。

不能不承认，我们对于汉字的研究确实是落后了。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汉语汉字研究所凭借的理论，仍然是西式或俄式的理论。当然，不是说这些理论不能借鉴，但是，长时间以来，实际情况是，并不是借鉴，而是以这些理论代替了符合于汉语汉字实质的理论创造。如果我们承认汉字别具洞天，有其独领风骚的方面，那么可以设想，揭示汉语、汉字独特本质的理论创造，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语言转向”，则一定会有与西方不同的别具风采的辉煌创造。

香港的安子介先生关于学习汉字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预言：“21 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但是，对此，人们立刻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汉字如何能在 21 世纪发挥威力？发挥威力应包括哪些具体内涵？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可能用三言两语说得清楚。过去，在“汉字落后论”影响下，人们还看不清汉字的优点。今天，在破除“汉字落后论”时，人们理所当然地要大谈特谈汉字曾长期被埋没的优点。这是易于为人们所理解的。但是，停留在只摆汉字的优点，还是不够的。还要回答何以会有这些优点以及这些优点有何意义等等问题。就是说，还必须创造揭示汉语汉字特有本质的理论。在这方面，西方语言文字的种种理论创造，应当成为我们的借鉴。对于传统中前辈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应有新的总结并以之为鉴。显然，探索这些问题，从事这方面的理论创造，对于寻找我们民族文化的根，以及从这条根上开出灿烂的新花和结出丰硕之果，都是非常重要而又饶有兴味的事情。在我们看来，这同样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的学者共同协力奋斗。那种把语言文字的研究仅仅看作是语言学家的事，已经是一种过时的陈旧观点，需要予以打破。正是站在这种立场上，我们才有勇气涉足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条波涛滚滚的学术之河。

人的本质具有极大的甚至不可穷尽的丰富性，以至人类要不断地对自身的本质反思。从上述可知，语言文字就是人的本质性的一种突出表现。那么，语言文字与人的其他本质性具有怎样的关联呢？我们知道，从古至今，思想家们下了许多反映人的本质性的定义。例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西塞罗说：人是社会动物。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卡西尔说：人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但是，所有这些人的本质性，都是在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界（包括这些领域的历史方面）交往与沟通中形成和显示出来的。可见，人与各方面的交往与沟通乃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更一般性的本质。而文字正是为满足人们这种最一般性的交往与沟通，由人本身创造出来的。如果说语言系统的产生构成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那么，文字系统的产生就是人类真正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

任何文字系统，作为人们交往与沟通的媒介，都包含有形音义三个方面，都是形音义的统一体。但是，汉字作为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的文字系统，又独具自己的特点。

第一章　汉字以象形性为根基

引　言

首先，在字形方面，汉字表现出自己独有的特征。西方的拼音文字，是由一定数量的字母之不同线性排列构成字词的，因此，它在视觉空间上表现为一维性。汉字相当于拼音字母的，是汉字的点画，而用点画组成的汉字词，则具有平面性的结构，因此，汉字在视觉空间表现为二维性。事实上，汉字平面结构的二维性，隐含着三维性，有如绘画用光线明暗、颜色深浅和遮挡等手法表现三维空间那样。正因为如此，汉字在字形上诚如赵元任先生所说："有很强的个性，你要在一页上找什么字，眼睛扫到近处，它就直盯着你，呼之欲出。"①

从文字作为形音义的统一体来看，汉字的字形与音义的关系，原则上也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与其音义的关系。简要地说，西方从象形文字演化为拼

①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79页。

音文字，最终完全抛弃了文字初始时期的象形性，变成了纯粹表音的符号化文字。这种纯粹表音的符号化文字即字母，其字形是直接表音，而不表义。例如 a、b、c、d、e……按照不同语系的读音规则，其读音在同一语系中到处都大体一样，但文字的意义则不取决于这些符号的字形，而是取决于这些符号拼成的不同音节的词。由此可知，西方拼音文字是一种以表音性为根基的文字。虽然西方各国也有地区不同的方言，但由于声音的根基基本相同，所以在交谈中操不同方言的人之间，不致于完全听不懂或不能沟通，而在我国在有些操不同方言的人之间，几乎完全不能交谈和沟通，尽管中国各地汉族的文字是一样的。

从字形与其音义的关系来看，汉字经过甲骨文、金石文、大篆、小篆到隶变，有一个质的飞跃。就是说，隶变这个质的飞跃，使汉字基本符号化了，或者说，隶变后的汉字，包括隶、楷、行、草诸字体，在与拼音文字的符号功能相比时，也具有大体相同的符号功能，并且在这方面已经得到心理学特别是神经心理学的科学证明。这种证明（将在后文详谈）。但是，即使如此，汉字的特点在于，当其隶变以后，这种质的飞跃只是扬弃了汉字的象形性，而不是完全抛弃象形性，并且似乎仍然以这种扬弃了的象形性作为根基。

Ⅰ．汉字造字法提供的证明

汉字以象形性为根基，可以从汉字造字法得到证明。最初创造的汉字，从传统的“六书”看，只有单纯表意的象形字和指事字。指事字尽管表示的字意已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例如数目字，但这种抽象性，仍然是借助于象形来表达的，而与后来传入的阿拉

伯数字的字码不一样。因此，在班固的《艺文志》中，称指事为象事。同时，他还把会意称为“象意”，把形声称为“象声”。事实也是如此，无论指事字、会意字，还是后来成为汉字主体的形声字，其事、意、声的表达，都离不开最原始的象形表意法。这表明，班固似乎比《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更深刻地洞察到汉字的基本构造均以象形为根基的特性。清代著名文字学家王筠称赞班固“六书”的提法“其次第最允”，似乎也洞察到汉字以象形性为根基的特点。

传统汉字的“六书”，其中的假借与转注并不是造字法，而是用字法。因而实际上属于造字法的只有“四书”，即上述的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众所周知，汉字最早产生的是象形字。汉字的成熟标志是以形声字为主体。但是，“四书”中的后三书即指事、会意、形声，何以没有抛弃象形性而仍然以之为根基呢？

首先说指事的造字法。这是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按照王筠的解释：“有形者物也。无形者事也，物有形，故可象。事无形，则圣人创意以指之而已。夫既创意不几近于会意乎。然会意者，会合数字以成一字之意也。指事或两体，或三体，皆不成字，即其中有成字者，而仍有不成字者，介乎其间以为之主，斯为指事也。’① 在这段话里，王筠首先把指事字与象形字加以区别，指明象形字所表意的对象是具体物。这种具体物有象，因此可以直接象形之，例如人、牛、羊、日、月、山、水等等。指事字所表意的对象即事，则是无象的，因此不可直接象形之，例如数目、上、中、下、正、美、秀、大、小、凶等等。同时，王筠还把指事字与会意字作了区别。他认为会意字是不同的字合起来构成的字，即象形字之间、指事字之间或象形字与指事字之间合成的字。但是，

①王筠：《文字蒙求》，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7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指事字的构成部分，如果分开来看，或者都不是字或者其中有字，但表意仍以非字的部分为主。例如上、下作为指事字，其大篆字形为、或二、。王筠释为“小物在大物之上，故为上。小物在大物之下，故为下。其小物高而狭者，则以象之，卑而广者，则以象之，故二皆合”。[①] 这其中，或，均不是字。另如，作为指事字，其大篆形为。王筠释为‘裹子也。从子，包乎子之外，裹之意也，非乃，非短羽之几”。[②]

然而，这里需要追问的问题是，王筠所说的“圣人创意以指之”,又是如何具体进行的？例如上述之字，虽然与牛即、羊即等象形字不同，不能以物象的某方面的典型特征象之。但是，字这类指事字，从根本上说，其表意并未离开象形这个根基。它是借包裹胎儿这条曲线来表意的。而这条曲线由于包裹在胎儿的外边，它既可使人想象为母亲的肚皮，又可使人想象为胎衣。所以，无论如何，字这类指事字从根本上说，也是借助象形表意的。即使就其更抽象的指事字中字即大篆中来看，也不例外。王筠将中释为：“以象四方，以界其中央”。[③]

我们看到，这仍然是以象形为根基。就是说，象四方，是四方之界，这种表意方式，仍然是借助于象形实现的。再就作为指事字的数目字而言，王筠指出“一、二、三同体”，即都是由一相叠而成的，并且有其具体的象形意，即所谓“一象太极，二象两仪，三象三才，至四则变数，即事也”。但是，四以后的指事数字，是否完全摆脱了象形性呢？也没有。例如，以而言，大篆为。王筠解释为‘以为正，河图五数居中，洪范五为皇极，

①王筠：《文字蒙求》，中华书局，1962年，第38页。
② 王筠：《文字蒙求》，中华书局，1962年，第45页。
③ 王筠：《文字蒙求》，中华书局，1962年，第39页。

故其字象交午之状，四通八达之意也。小篆作,其意便不见”。[①]就是说，数目字产生的初始阶段，尚不能完全摆脱与具体事物的联系。大篆正是用这种交叉路口的形象来显示其意的。小篆变成，其中仍保留。由此可见，也不是如王筠所说“其意便不见”，相反，其原初的象形根基仍然保留下来了。

在明确了指事字的“创意”仍然以象形为根基，则会意字和形声字造字“创意”也以象形为根基，就容易理解了。因为会意字，如前所述，不过是象形字和指事字的不同组合形态；而形声字，无论形意旁还是形声旁也都是原来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及其变形体。因而，会意字与形声字，也必然都是在象形的根基上产生出来的。或者如班固所说，会意字不过是象意字，形声字不过是象声字。

Ⅱ．现代心理学实验研究所提供的证明

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初，我国心理学家刘廷芳，于 1921 年就在哥伦比亚大学首次对中国汉字作实验研究，主要是在汉字字形与字声对字义的记忆影响方面。他的实验结果表明：“汉字字形对字义的影响，大于字音对字义的影响。……字形所产生的联想作用，远较字音的作用为大。”[②] 这是首次从心理学的实验结果上所提供的汉字以象形性为根基的证明。

在刘廷芳之后，我国心理学家艾伟在华盛顿佐治城大学，于

①王筠：《文字蒙求》，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8 页。

② 转引自《中国语文的心理学研究》(高尚仁、郑昭明主编),(台北)文鹤出版有限公司，1982 年，第 3 页。

1923年、1924年两年对于汉字的形、音、义三方面进一步作实验研究。他取得的实验结果是，在汉字的学习过程中，对于学习者来说“形义组成的联结较形声组成的联结耐久甚多”“联结较弱的字若长期不用，形声方面先行解体，然后方为形义，但不会完全消失”，然而，“形义联结消失后，形声联结完全不再引起反应”。[①] 艾伟的实验再一次显示和证明，汉字的象形性即以形表意，或者这里所说的“形义联结”，乃是汉字构成的根基。因而才在学习者的记忆上表现为，虽然其学习时“形义联结”与“形声联结”同时建立起来，但是，作为根基的“形义联结”却比“形声联结”坚固耐久。

然而，上述汉字以象形性为根基的心理学证明，也曾经被认作“汉字落后论”的证明，即由此而认为汉字是所谓“图形文字”或“落后文字”。特别是有的神经心理学实验，得出与西方文字认知时显示左脑优势正相反的结果，即汉字认知时显示右脑优势。这样，就更加强了汉字为“图形文字”或“落后文字”的观点。不过，这种观点和支持他的神经心理学实验，已被近来国内外新的科学实验所突破。就文字的符号功能而言，新的实验表明，汉字并不亚于西方文字，同样在认知过程中显示为左脑优势。对此，香港的安子介先生在致曾志朗教授的信中，有其具体揭示：“最有趣的结果来自看图写字：左脑受伤的病人写不出汉字，而右脑受伤的病人除了有倾向把字写在格子的极右端外，每一个写出来的汉字都完整无缺。也就是说，右脑损伤确实破坏了绘图的能力，但对于汉字的书写能力却没有丧失。这可以说是对把汉字当作图形文字说法的一个最好的反驳。我们要大声疾呼：汉字是语

①转引自《中国语文的心理学研究》（高尚仁、郑昭明主编），（台北）文鹤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4页。

言符号之一，代表着抽象的语言和语音概念，它绝不等同于图画……右脑病人对外在空间的掌握确有左视忽略的问题，但对于汉字，有内在的空间组合层，可以毫无失误地把它控制在脑海里(即使是对空间有特别能力的右脑受了伤)。这是个很重要的发现，美国剑桥学院的 John Marshall 在他们最近的著作里提到这个结果，他们重复了我们的发现。为了证实汉字认知，除了通过纯粹视觉管道外，还有一条‘字形机动码’的途径可走……我们发现右脑病人和正常人一样都没有困难认出这些字，但左脑病人则几乎不能认出任何一个字。’①

不过，如前所述，汉字虽然在隶变之后已经符号化了，但是，汉字这种符号化并未如西方表音文字那样完全抛弃象形性，而是扬弃地保留着象形性。因此，这里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汉字的象形性根基在人的认知过程中，难道不应有它独特的神经心理反应吗？最新的神经心理学实验表明，既不应片面地把汉字归结为显示右脑优势的“图形文字”或“落后文字”，也不应片面地把汉字归结为显示为左脑优势而与西方表音文字完全无别的文字。新的科学实验表明，汉字认知在神经心理中所显示的，乃是左右脑均势。

中国《心理学报》 1990 年第二期所载《藏族维吾尔族在表音表意文字辨认上大脑两半球功能的特点》一文指出：“用半视野速视术对藏族、维吾尔族人（各 60 名），进行辨认表音、表意文字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藏族还是维吾尔族，对汉字（表意文字）的辨认，却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对熟练掌握和使用汉语多年（五年以上）的藏族被试出现两半球均势，而学习一年左右的藏族和维吾尔族被试却为左半球优势。这表明对表意文字汉字的

①《汉字文化》创刊号， 1989 年第 1、2 期，第 69—70 页。

辨认是两半球均势的，对表音文字藏／维文的辨认似乎受被试使用汉语的影响、会由左半球优势转变为两半球均势。”①这篇文章在讨论其实验结果时，具体地分析了汉字认知中两半球均势的优越性，即汉字在具有表音文字符号功能的同时，还具有表音文字所不具有的特殊功能，并认为这种特殊功能正是由汉字的象形性根基所决定的。如该文所指出的，“为什么即使被试在辨认属表音文字的母语时是右视野—左半球优势的，而对属表意文字的汉字辨认时，则仍如汉族的被试一样，是两半球均势的？我们知道，汉字是有其不同于表音文字特点的，有人认为大脑两半球对汉字信息处理的方式可能有其特点。就是说，表意文字的汉字不同于表音文字，它与读音不发生直接联系……同时汉字既有语言意义又有极强的图形性。因此对汉字的信息处理方式，不仅有‘形一音一义’语音转录的声音编码方式（它主要是左半球的功能），也有‘形一义’的形态编码方式〔它主要是右半球的功能），故此对汉字的辨认就必须大脑两半球共同参与，于是出现两半球均势作用，我们认为，本实验结果可能与此有关”。②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上述现代神经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再一次证明，汉字作为信息的载体，如同此前喻柏林在其关于汉字认知心理研究中所指出的，在同表音文字相比较时，汉字具有“多维编码”的性质。③因此，在相同的条件下，汉字比表音文字具有更浓缩的更大的信息量。此外，上述神经心理学研究还证明，在文字从象形为起点的发展中，表音文字最终是以彻底抛弃象形性为其结果的，从而表现出以声

① 此文作者为华南师大神经生理研究室的王克虹、许世彤、区英琦。

② 参见《心理学报》，1990年第2期，第194-195页。

③ 参见喻柏林：《汉语语词码相加效应的实验研究》（《心理学报》，1986年，第一期）；喻柏林：《汉语语词码相加效应的实验研究之二》（《心理学报》，1986年，第3期）。

音为根基的种种特性。汉字则是经过隶变以扬弃象形性为其结果的，就是说，经过隶变汉字也基本符号化了，但仍内含象形性这种根基，从而汉字能在发挥符号功能的同时，还表现出以象形性为根基的种种特性。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研究的误解，似乎产生于把汉字经过扬弃所保留的象形性混同于原始象形文字的象形性，以致错误地认为汉字仍是作为图画文字的原始文字或落后文字，否认汉字是现代文字和具有现代文字的符号功能。但是，今天当我们承认汉字具有现代文字的符号功能时，却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否认汉字的象形性根基。因为，象形性根基只是被扬弃，并未被取消，并且仍然构成汉字的基本特征和优越性。

Ⅲ．书法艺术与汉字能传递古代社会信息所提供的证明

汉字以象形性为根基还表现在，汉字的书写，已经历史地形成为一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门刻意追求线条美的艺术。从内容上看，这是一门通过线条的跃动凝结和体现民族灵魂的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法艺术是中国真正的国粹。汉字的二维性（隐含着三维性）及其笔画的多样性，不仅为书法艺术追求线条美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为这种追求提供了广阔多彩的艺术空间。关于书法艺术追求线条美这种意蕴，唐代大书法家孙过庭在其《书谱》中曾作过如下的精彩描述：

> 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椐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